

人类学学科建设与海外 他者文化研究

□刘夏蓓

[摘要] 通过比较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研究的差异,提出在保持中国人类学学科特色的同时,应尽快与世界人类学接轨,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与中国冲突较多的“他者社会文化”及“国民性”展开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发挥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强项和文化应用研究价值,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 异文化;反观;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2)02-0099-03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Overseas Cultural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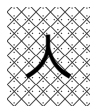
LIU Xia-be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inter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hile retaining its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anthropology should keep pace with international anthropology as soon as possible. It's also suggested that Chinese anthropology should mak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tudies of the important theoretic issues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culture of others" and "nationalism" which are often in conflict with China. It's a task of top priority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eriority of basic theoretic research of anthropology and applied research of culture.

Key Words: other cultures; introspection; development

一、西方人类学学科史回顾



人类学从脱胎哲学之日起就以研究文化为己任,“初长成”的人类学即将全人类文化看作一个整体,雄心勃勃地欲建构整个人类的文化史。于是,作为人类文化整体、文化史组成部分的“异文化”就进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视野。随着一部部“他者”民族志的诞生,人类学也逐渐成为以研究异文化并通过比较反观“己文化”而见长的学科,其较强的文化反思能力与批判精神贯穿于研究成果之中,在人类学最辉煌的19世纪,“人类学家通过比较文化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整体,有着出乎我们今日之想象的冲击力”。^[1]

纵观西方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历史,从以西方为标尺的“社会进化论”,到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

相对论”;从种族研究视角的生物决定论到族群研究视角的文化决定论;从“扶手椅学者”的文献研究到田野工作方法,再到“理解他人理解”的文化解释视角,一个通过把握异文化,理解己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包容文化多元性的学科精神的形成发展轨迹清晰可见。如今的“人类学致力于将人视作有内涵的完整形态来研究,它更关注人的‘身心’‘身外之物’之间关系的探究,更侧重于‘小我’与‘大我’的辩证,更集中于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包括‘我’与‘他’、前人与后人之间)、自由与规范之间、‘分离’的必然与‘团结’的必要之间(包括认同与等级之间)的关系之理解”。^[1]但是,人类学通过主客位转换,达到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把握,以比较视角审视己文化,并从文化独特性中寻求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性与根

本规律,从而成就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的学科追求并没有改变。“人类学的这种学科定位不仅使它成为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具有独特对象和方法的独立学科,而且使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优秀代表:其一,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就成为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除了与人类学相通的民族学之外,社会学、民俗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乃至传播学都在做这样的民族志。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志既是一种文体,也是对于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其二,人类学以整体观(holism)看待社会,把一个社区当作微型社会来研究,包含关于对象的政治、经济、宗教、亲属制度等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甚至本身就发展出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的分支,俨然就是微型社会的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其三,人类学关于特定社会的民族志著作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积累关于该社会的经验事实,提供第一手的经验材料,使该国的其他学科的专门研究有了一个共同而共通的经验资料的基础。”^[2]由此,人类学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几乎所有有条件的综合大学都设有人类学专业。

二、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

知识体系之构成有其自身的逻辑,但也时常为“世俗秩序”所牵连。人类学自传入中国以来,可谓命运多舛。“在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比较发达的英国和美国,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对于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一方面是针对特定地区、国家或社会的研究,如非洲研究、太平洋岛国研究、南亚研究、中国研究、农耕社会研究、游牧社会研究;另一方面是以此为前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对于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关怀,如萨满教研究、馈赠研究、经济理性研究、社会组织研究。”^[2]与欧洲人类学研究异文化起步不同,中国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的起步有一点相似之处,即都是以研究“己文化”开始。美国的人类学起步之初,就面对着欧洲国家人类学不曾面对的“土著人问题”,因此,其人类学的研究始于死里逃生的印第安人族群研究。中国人类学研究也始于本土研究,当然,与美国人类学的本土研究对象的性质不同,中国人类学的本土研究对象并非种族灭绝劫后余生的土著,而是中国的汉人社会和少数民族社会,中国学者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与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欺凌,学者救国图强抱负有着直接的关系。中美人类学虽同起步于

本土研究,但美国人类学很快将研究目标从本土延伸到了他者的异文化,并在比较的视角下反观己文化,创立了一系列理论并在应用层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具有“大人类学”(即包含人的体质与文化研究的人类学)特点的美国人类学学科特色,与此同时,也与世界人类学接轨,成为世界人类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人类学目前却仍然止步于己文化,停留在对本国少数民族、汉人社会的研究中,且面临着学科名称各异、学科归属认识不统一、学科地位不明确、学科研究与世界不接轨、学科整合任务艰巨等问题,特别是存在着与“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学科关系和研究对象等问题上的种种“理还乱”的纠葛,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名称和研究范围等也成为制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问题。

中国人类学学科定位“错乱”,并非是本土造成的,而是与“西方人类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是由众所周知的欧洲、英国和美国不同的西方人类学学科传统所决定的。中国老一辈人类学家杨堃先生在之前就指出,民族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观点可分四类,一是19世纪早期的观点,即认为民族学等同于人类学;二是19世纪晚期的观点,即认为民族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三是认为民族学是广义的、包括人类学的学科;四是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是两门不同学科,人类学是致力于人类体质特征与种族研究的学问,而民族学则是以民族和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另一门学科。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此前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百花齐放之势大为减弱。国家直接介入学科建制后,社会学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中“缺席”了,人类学和民族学也按照苏式的定义得到了“统一规定”,分别指体质人类学(尤其是古人类学)及“民族问题研究”。时至今日,“仍有将人类学视作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的学术机构(特别是科学院)。在这些机构里,所谓‘人类学’等同于研究人的体质衍生史的‘古人类学’。在另外一些机构里(特别是综合性高等院校),人类学被当作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在一些与‘民族’相关的特殊教学科研机构(特别是民族院校与民族研究机构),人类学则时而被等同于‘民族学’,时而被视为是与之对立的学科(不少人误以为,‘民族学’是‘本土的’、有益于政治的,而人类学则是某种无用的、西式的文字游戏)。更有法国年鉴派社会学及英式社会人类学将人类学视为社会学的一部分”。^[1]

综上所述,可以说,人类学在中国不仅“本土化”和“整合度”低,而且,由于研究对象为本土文化,无法以比较视角反观和反思己文化,这一切与西方传统、学科整合不足以及文革对学科毁灭性打击有关,

也与中国被西方国家孤立,人类学一直没有条件,没能走出国门研究“他者”文化有关。毋庸置疑,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多样性使中国的人类学在本土就拥有丰富的文化研究资源,也形成了中国人类学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汉人社会研究的重视和重要成果。但是,这并不能替代对海外他者文化的研究,也不能取代比较视角和己文化的反思,这是人类学研究的灵魂所在。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不能够客观对待自己的文化,或妄自菲薄或妄自尊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他者文化的理解、欣赏、尊重与包容。因为,“对他者世界的认识过程是一个文明化过程,体现着人类的文化敏感性和自觉性,包括对文化差异的包容。在缺乏对‘他者’世界理解的时代,我者对他者必定‘残忍’,因为任何不同与我者的人即野蛮人。欧洲历史上的大规模族群之间的残杀即为一例……研究也证明,人类知识的产生,特别是研究人类自身文化的知识的产生,如果仅仅考虑我者而不考虑他者,那么这种知识体系必带有偏见,也必然以我者世界为中心。西方历史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自以为是的悲剧……从他者的眼光中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我者的面目,因而在比较中发现我者和他者的差异,同时发现我者和他者的同性。后者其实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人类共鸣的根基”。^①人类学正是肩负着他者文化研究重任的学科。

三、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转向

当今世界,中国也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缺乏与世界交流的国度,不仅具备了人类学走出国门,完成“三圈”^②研究的条件,而且,“今天中国要发展,在空间上就是一个走进国际社会的问题,在观念和知识生产上就是一个把国际社会纳入我们的思想、纳入我们的知识生产体系的问题”。^[2]海外他者社会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时代赋予人类学的责任。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加入WTO等国际组织,中国经济与世界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的文化也走出国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角色。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在欧洲等一些国家发生了利益和文化的多种冲突,并因为低估或忽视文化风险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中国的国际形象片面化、刻板化、负面化。这一方面固然是源于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但双方缺乏对各自文化正面的了解、理解与包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对“他者文化”研究的缺乏,使我们不能够在经济开发活动中把握他者的文化规则而避免经济损失,也使我们不能够用他者所能理解的文化表述自己的经济、文化观点,使世界理解中国的高速发展与对世界的友善。而“他

者”对我文化的不理解,则形成了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种种猜忌和突破任何国家历史记录的经济制裁。这就要求我们除了国家利益及外交政策层面的海外研究,还迫切需要对海外他国的“国民性”、他者的社会文化等展开文化层面的研究。“中国人类学当前应该有一个新的转向:以整个世界为实地调查的田野,而不再局限于以本国为田野。我们学界应该从理论和个案两个方面推进这种转向,并借此促进中国社会科学以新的知识生产机制获得进一步发展,增强中国知识界在学术和文化上的主体意识。”^[2]

当前中国人类学研究,由于学科定位和地位的模糊,对当代“他者”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的缺乏,造成了在当今中国经济文化迅速走向世界浪潮中学科研究的缺位,这与学科应有的地位及应该发挥的作用不符。我们以为,当下整合人类学研究队伍,明确人类学学科归属,提升人类学学科地位,从而,在保持中国人类学学科特色的同时尽快与世界人类学接轨,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关系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和与中国冲突较多的“他者社会文化”及“国民性”展开深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发挥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长项和文化应用研究价值,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与人类学传入中国之初不同,当今中国的发展需要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也具备了使人类学走出国门的条件,我们相信中国的人类学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促进学科建设的发展,使之具有与社会学、民族学相同的学科地位。这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人类学的“成年礼”。^④

[参 考 文 献]

- [1]王铭铭.人类学讲义稿[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2]高丙中.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J].中山大学学报,2007,(3).

收稿日期 2012-02-02

[责任编辑 胡宝华]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刘夏蓓(1963~),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宗教学与社会学。北京,邮编:100875。

① 景军,《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思考》,未刊稿。

② 王铭铭提出人类学研究的“三圈说”,即研究汉人社会文化、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和海外社会文化。